

# 論蘇聯在東亞的戰略利益

洪孟啓

## 一 蘇聯戰後的主要安全利益

對於蘇聯戰略的演變，作者將在本文中希望由兩個方向去理解：其一為何者屬於蘇聯改善態勢的行為，即改善其地位、增進其選擇自由、爭取行動空間以及限制敵人行動；其二為何者屬於蘇聯整個佈局中的第一階段行動，即對於以往的目標給予適當的檢討，並據此來擬定新的行動方針。

二次大戰結束時，蘇聯所處的狀況是戰時盟友關係終止，美蘇衝突日益尖銳。對於原子彈的問世，史達林雖於口頭上一直在排斥其恐懼性，但內心實不致予以忽視，且暗中進行發展。為應付以上兩種情勢，史達林乃實施了三項對策：(一)尋求外圍安全保護地帶，繼續要求他國承認其侵略所得的既成事實，並推展「前進政策」，利用各地所呈現的紛亂及地方民族主義力量，以提高其追求安全及擴張勢力範圍的機會；(二)展開和平運動(Peace Campaign)<sup>①</sup>，目的在造成一種世界輿論，削弱美國所領導之反蘇力量 and 核子優勢；(三)嚴格劃分敵我間意識形態之界線，由日丹諾夫發揮「兩個陣營」的學說，強調共產黨人的傳統任務，希望藉東、西方各國共黨之積極行動，以保障蘇聯的安全利益<sup>②</sup>，以及(四)於一九四七年建立了共產情報局(Cominform)以加強共黨集團內之紀律。

大體而言，對於前述戰略的執行，史達林之所以獲得成功，主要乃賴其軍事力量，至於宣傳、說服則居功不大。不過由於史達林之過度強調軍事、政治與意識形態，流風所及，遂使其後繼者負擔過多，而導致政策之失去彈性。一九五三至五四年間之國防辯論，顯示蘇聯對核子武器觀念轉變，並意識到蘇聯本土之內不可能再有「安全」地帶，陸軍亦無法再如一九四一至四二年間的「以

註① 和平運動於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三月，首先由法共開始，稱為“Combattants de la Liberte”。See Marshall D. Shulman, *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85.

註② 關於兩個陣營學說，主要重點即認為對美國及「帝國主義陣營」的新戰略讓步，乃無異鼓動這些政策制定者「更為冥頑，更具侵略性」。這種一分為二的意識形態，基本上乃來諸一種必須維持一敵對關係的推想，希藉兩個基本對立的世界體系的形成，以保持攻勢的政治概念。

See J. M. Mackintosh, *Strategy & Tactic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86-87.

空間換取時間」。一九五五年，蘇聯軍方終於獲得了結論，認為美國的長程核子武器對蘇聯安全構成了威脅，因此在國際裁軍方面，蘇聯應加重衡量，以迫使美國先放棄核子武器，並壓迫美國裁減傳統武力<sup>③</sup>。同時，蘇聯決策單位決定集中力量，發展核子武器，直至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事件之後方重新恢復早先的多元發展。

赫魯雪夫在政治上的主要對手，是以馬林可夫為首的官僚集團。為勝過這些較溫和並易於滿足現狀的競爭者，及平衡有關史達林的神話印象，赫魯雪夫乃在政策上採取了大膽的行動，對舊有計劃加以劇烈的變更。赫魯雪夫起初是與黨、軍利益集團相結合，目的在尋求彼等之支持，藉以加強對官僚集團的鬥爭，遂不得不注重於重工業及國防。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由於核子武器連續試驗成功，大為提高了蘇聯核子外交的身份，及其在附庸國與第三世界中的威望，於是赫魯雪夫亦開始主張「大舉報復」及「嚇阻」的政策。後來由於一九六一年底「飛彈差距」(missile Gap)的揭穿，以及翌年古巴事件的鍛羽，使得赫魯雪夫的行動大受限制，最後終於導致其下台。自此而後，蘇聯的行動即稍事收斂<sup>④</sup>。

自一九六〇年代中期以來，由於以下諸因素的影響，使得蘇聯的戰略地位漸趨於劣勢：(一)美國全球性積極政策的推展與核子優勢的重新恢復；(二)英法各國並未因殖民體系之結束而崩潰；正是相反，因為相互依賴的成長 (growth of interdependence) 而迫使亞洲新興國家對先進開發國家的經濟、技術協助更有所需求；(三)戰後所形成之社會主義聯盟紛紛解體，蘇聯失去了意識形態的強制力，尤其是由於匪蘇衝突與捷克自由化的挑戰，使蘇聯面臨了來自東、西兩方的壓力；(四)蘇聯可信度的降低和積極性可靠朋友的減少，如一九六六年迦納恩克魯瑪 (Nkumah) 的倒台，和一九六六年三月印尼蘇卡諾的失勢等，都是顯例<sup>⑤</sup>。因此在改善態勢及戰略佈局上，繼承赫魯雪夫的布里茲涅夫政權似乎是基於下述假定：即在無重大變化的前提下，蘇聯的西疆大約可以保持安全，但在亞洲東方則處於不確定的情況中，因此布里茲涅夫積極從事於緩衝體系 (buffer system) 的建立，一則期藉「弛緩」緊張的

註③ See J. M. Mackintosh, *op. cit.*, p. 97. 季辛吉認為蘇聯直至一九五四年以前，一直未將核子武器有系統的納入軍事思想之中，並且在此之前一直未予重視。See Henry A. Kissinger, *Nuclear Weapons and Foreign Policy* (N. Y.: Harper & Brothers, 1957), p. 388.

註④ 一九六一年秋，甘迺迪下令統一判斷蘇聯軍事能力，把艾森豪政府時期的三個機關，統合於新成立之國防情報局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 之內，同年九月國防部副部長 Gilparth 發表聲明，顯示飛彈差距告終。甘政府發言人並有意指責艾政府應對飛彈差距之錯覺負責。一九六二年十月廿六日，赫於致甘函中承認，假如雙方不發揮智慧，則將超過衝突而展開相互毀滅。古巴事件說明了強迫辦法之失敗，因此往後數年，蘇聯即自動約束自己，以免引起美國之重大對抗。對於蘇聯態度收斂，有人以此象徵東西契約關係模式之日漸形成，並以為蘇聯對於世界政治的認知乃確定了競賽規則，並使博弈之基本方針予以修正。即由零數競賽 (Zero-Sum game) 修正為混合動機競賽 (Mix-Motive game) 一此由於競賽雙方在防止災難上均具有最高之共同利益，其結果是談判與合作本身不是目的，主要是適應改變的情勢。See Edgar M. Botome, *The Balance of Terror*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p. 54. 卓文宗譯，「戰略均勢階級中的蘇俄」，六二頁、七二頁、七三頁。李其濤譯，「蘇俄由對抗到共存中心冒險行為」，一七頁、一〇六—一〇七頁。

註⑤ Z. Brzezinski, "How the cold War was Played"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2, Vol. 51, No. 1, pp. 188-189, Robert Legvold, "The Nature of Soviet Power,"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7, Vol. 56, No. 1, pp. 51-52.

較廣泛辦法和利用商業手段，與西方獲致「均勢」謀求穩定；二則期藉區域性衝突的有力控制，以免被迫介入這些衝突而與美國的全球性利益正面相對立。

若單以七〇年代而言，蘇聯的戰略目標，係以「安全」及構成「安全」之重要成份為主。具體言之，則包括：(一)蘇聯本土疆界的完整；(二)東歐衛星國的臣服；(三)西歐各國對於既成事實的承認；(四)在亞洲贏得影響力，並建立一新型的集體安全體系，以解決區域性的爭端及應付中共可能的挑釁；(五)一旦蘇聯在東方介入衝突時，設法使美國保持中立。就整體而論，這些戰略優先目標多屬於防禦性質；不過，由於蘇聯政治地位與戰略力量的日形膨脹，已使克里姆林宮不可能再侷限於「俄國堡壘」的觀念；同時，也由於蘇聯決策者對於「緩衝體系」與「前進基地」的價值至為重視，乃使蘇聯的戰略部署更減少了不積極向外發展的可能性。基於此一觀察，當可瞭解七〇年代蘇聯之所以要積極擴充政治與軍事能力，除了其原有的防禦考慮外，還應該再加上蘇聯新近所形成的攻擊性傾向<sup>⑥</sup>，譬如當一九六〇年代末期蘇聯與中共發生邊界衝突後，克里姆林宮在東亞所作的戰略部署，即是一個範例。

## 二 東亞在蘇聯全球戰略中的角色

就地理意義而言，「東亞」可包括日本、朝鮮半島、蘇聯和中華民國臺灣澎地區與大陸本土；但就政治影響力以及相關性而言，則美國及東南亞等新興國家亦不可予以忽略<sup>⑦</sup>。從利益性問題來看<sup>⑧</sup>，對於蘇聯在東亞的政策可由以下兩大方向作一鳥瞰。

(一)歷史性的區域利益：此與沙皇時代的政策目標有部份連貫性，並較具穩定性。在全盤性的考慮上，蘇聯乃淵源於以下兩個主要前提：第一、對於中國龐大人口及日本崛起的傳統恐懼；第二、隨沙俄時代以來介入歐洲和全球性事件之同時，而在亞洲可能會面臨著的壓力比重。因為在遠程利益的權衡上，迄今為止歐洲仍然為蘇聯的主要目標。傳統上，當蘇聯面臨較重要的歐洲安全問題時，克里姆林宮往往就要設法保持一個平靜的亞洲。因此，儘管隨著與中共的衝突而使東亞在蘇聯的戰略權衡上，已成為主要的關切區域之一，但是在面對全球性的選擇時，蘇聯對亞洲區域的考慮仍然是居於次要地位。蘇聯在亞洲的戰略佈局及改善上，顯然是「一種保持長期持久的態勢」<sup>⑨</sup>。(二)可變性的區域利益：此種利益較易隨著時間而變更；因此，在判定的方法上，作者願意以十年為一

註⑥ 季辛吉及其同僚曾表示：「蘇維埃俄羅斯才剛開始其真正地『帝國』階段。」此話一語道出蘇聯之侵略性傾向。Quoted from Robert Legvold, *Ibid.*, p. 50.

註⑦ Robinson 劃分東亞係綜合地理與影響力二項因素。See Thomas W. Robinson, "Soviet Policy in East Asia,"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1973, p. 32. See also Ray S. Ch'ne, *World Power Assessment* (Washington D. C.: Westview Press, Inc. 1975), p. 5.

註⑧ 關於國家利益的論述很多，在此作者擬採取以下的規約，即國家利益包括物質存續(Physical Survival)、自由(Liberty)與經濟的生存(Economic subsistence) See Alexander L. George & Robert Kohane,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Orbis*, Spring 1977, p. 125.

註⑨ 對於「長期持久態勢」的解釋，除由軍隊部署上了解外，另外蘇聯軍區司令官的階級亦為一項特徵。其亞洲各軍區只有中蘇邊界第一線上中亞細亞、貝加爾、遠東三軍區，司令官為大將，而其他十三軍區則全為普通上將。久住忠男，「國際時評月刊」，一九七四年六月號，趙倩譯，「蘇俄與亞洲的和平——以匪俄對立為中心」，中共研究選譯，第四期，(台北：國際關係研究所，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五一—五二頁。

階段，來觀察蘇聯在各時期內具體的特徵。

1、一九五〇年代：(1)安全利益：主要是預防美國利用日本資源對付蘇聯。蘇聯的政策乃在阻止美國控制亞洲，此一利益促使蘇聯與中共、北韓建立密切關係，並支援韓戰。(2)「革命」利益：鼓動並支持「反帝」、「反殖」革命，期將亞洲新興國家納入於蘇聯所領導的社會主義聯盟之下。於是乃試圖指導各地共黨，進一步影響東亞各國之「革命」；(3)經濟利益：除對中共之外，在東亞其他地區並無重要經濟利益。蘇聯曾試圖與中共合組「共同經營」之股份公司，藉以榨取大陸資源，幫助蘇聯重建戰後經濟，但成效並不大。

2、一九六〇年代：(1)安全利益：繼續以美國、日本及中共在東亞轉變期中的介入為中心，其細節包括：A、蘇聯急於防止美國利用日本之經濟力量對付蘇聯，並使日本無法獨立並積極地介入此一地區中的事務。B、遲滯中共的經濟成長，防止中共之意識形態蔓延到亞洲其他區域，尤其是防止中共對北韓、僑蒙及北越的影響力。C、鼓勵美國保持對中共的圍堵，並設法使日本仍然疏遠中共，不與中共建立友好關係。(2)「革命」利益：蘇聯在一九六〇年代對於促進「革命」之興趣逐漸減弱，主要原因為美蘇關係之改善，以及中共與蘇聯關係的惡化。蘇聯領袖認為，與亞洲新興國家發展友好關係，比援助「解放」運動更為有利<sup>⑩</sup>。此時，蘇聯已不再堅持「俄式革命模式」可以適用於全世界，而改採指明蘇聯社會的各種優點的策略，換言之，即改以迂迴方式來獲取「外圍保護圈」<sup>⑪</sup>。(3)經濟利益：此時進入低潮，蘇聯停止了對中共的經援，撤退技術人員，雙方貿易亦接近於零。蘇日貿易停滯於低水準。唯一與蘇聯有較密切的經濟關係者，唯在北韓方面。

3、一九七〇年代：(1)安全利益：一九六〇年代與中共之邊界衝突，使蘇聯不得不徹底重新確定其軍事優先政策，克里姆林宮決定將遠東列為另一個「正面」，並且更以防備中共為其安全利益的樞紐。因此，在戰略設計上，乃設法使中共不與美、日接近，確保日本一旦在政策上脫離美國之後，也不致與中共聯手制俄。蘇聯對以上的戰略設計，其第一步即為阻止反蘇小聯盟——如美國與中共、或美國與日本、或日本與中共——的結成。為達到此目的，蘇聯遂對美國、日本和中共分別採取了不同的策略：A、在對美方面，蘇聯是積極地改善兩國的關係，例如美蘇柏林西德問題協議的達成，戰略武器限制談判的進行，雙方貿易大幅增加，科學、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促進，以及尼、布交互訪問等，均為其具體表徵。蘇聯希望在與美國解決安全和其他問題的同時，至少能搶先一步，使華盛頓方面感覺到美蘇間的關係，是要比華府與北平之間的互通款曲，更為重要的多。B、對日本：蘇聯是採取談判讓步的政策，期藉對日本之經濟誘惑，以及折衷解決北方漁業問題之政治性暗示等，迫使日本不與中共過份接近。C、對付中共：蘇聯

註⑩ R. A. Yellon, *Shifts in Soviet Policy Toward Developing Area 1964-1968* (Waltham, Mass: Ginn-Blaisdell, 1970) pp. 226-232, p. 234.  
註⑪ Vernon V. Aspaturian, "The Challenge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Morton Kaplan ed., *The Revolution in World Politics* (N. Y.: Wiley, 1962), pp. 209-232.

不僅採取審慎的容忍，致力於緩和中共之敵意，而且積極加強軍備，嚇阻中共不得發起軍事行動。倘若中共不願修好，而日、美間之關係仍屬密切，則蘇聯之第二步驟為：全力阻止反蘇大聯盟的形成。

(2)「革命」利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美國以關島聲明方式，表明了其欲抽身「亞洲糾纏」的意圖；在這期間，蘇聯與中共間之衝突更形尖銳化。面臨著此種情勢，蘇聯所必須要應付的，乃是在意識形態和實際行動兩方面來圍堵中共。於是在西方則以「和解」的虛幻氣氛，促使西方陷於窘惑與迷惘之中，並使歐洲不願介入在未來可能發生的東亞衝突，利用此計來孤立美國<sup>②</sup>。蘇聯為了能將該一區域之革命利益，與其全球性的戰略設計相重疊，乃揭褻了「亞洲集體安全」觀念。欲利用此種觀點以削弱美國在亞洲之影響力，並阻絕中共對各新興國家的革命支持與勢力擴張。在上述策略之下，蘇聯期望能避免中共的未來冒險行動，增強蘇共在東亞的領導權，並不致使蘇聯陷入與西方發生軍事衝突的泥沼中。

(3)經濟利益：基於對中共可能發起邊界戰爭的事先預防，蘇聯將開發西伯利亞視為重點工作。在這方面，日本又為蘇聯所要吸取的主要對象。然而，目前的障礙是，日本領袖急於在蘇聯與中共之間保持著平衡關係，不願因介入西伯利亞的開發工作而激怒中共，同時亦懷疑此一合作會對日本的遠程利益帶來何種重大價值<sup>③</sup>。

總之，蘇聯在一九五〇年代的戰略，乃是以聯合中共，抵制美、日為中心。但是由於在政策上，蘇聯犯有一開始便忽視與中共同一步調的錯誤，因此加深了六〇年代初期匪蘇雙方的爭執，迄至六〇年代中期，蘇聯對中共的圍堵已高於對美國的對抗<sup>④</sup>。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由於尼克森的北平之行，乃使東亞情勢呈現了高度的流動性。對蘇聯而言，乃產生了下列三種前所未有的變數：即美國對中共結盟的可能、日本與中共結盟的可能、和日本由區域性經濟力量轉變為政治力量的可能。此三種變數的出現，迫使蘇聯的戰略優先順序不得不產生了明顯的變化，即由一九五〇年代的先歐後亞，轉變為一九七〇年代的東亞與歐洲並重。同時，為了要不使東亞問題成為聯蘇整個外交政策中的絆腳石，而得以區域性的「安全之改善」，來使蘇俄能全力對付全球性之主要競爭者——美國，蘇聯是不願意因中國問題而引起大規模的衝突的。因為在權衡輕重之下，中共只是一個區域性的競爭角色，倘若蘇聯被此一區域性的角色所釘住，單就政治意義而言，是得不償失的，若就歷史意義而言，則更是十分不自然。因之蘇聯應付中共的方針

註② Sir Robert Thompson 原著，卓文宗譯，全球戰略的革命戰爭（台北：黎明書局，民國六三年八月再版），一一六一—一一〇頁。

註③ See "Japan at the Crossroads," *Survey*, Autumn 1972, pp. 30-159; Violet Conolly, "Soviet-Japanese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iberia," *Pacific Community*, October 1970, pp. 55-56; David I. Hitchcock, Jr., "Joint Development of Siberia: Decision Making in Japanese-Soviet Relation," *Asian Survey*, March 1971, pp. 279-300; T. C. Rhee, "Japan and the Soviet Union," *World Affairs*, June 1970, pp. 240-257; Martin E. Weinston, "Japan & the Continental Giants," *Current History*, April 1971, pp. 193-199; Kiichi Sasaki, "Toward Japanese Cooperation in Siberian Development,"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72, pp. 1-11.

註④ Arnold L. Horelick, "Soviet Policy Dilemmas in Asia," *Asian Survey*, June 1977, p. 501.

可以歸納爲：(1)防衛蘇聯領土，對抗中共可能之攻擊；(2)阻止中共與美國形成聯盟；(3)破壞美、日聯盟；(4)解除日本武裝，不使日本與中共攜手。在這幾個大方針之下，蘇聯可能以下列幾個具體行動，作爲其基本的對抗措施：(1)嚇阻中共不敢發起冒險行爲，蘇聯本身則竭力避免採取足以觸發大規模核子互擊的反中共軍事行動；(2)與美國解決安全和其他重要問題，以期在美國與中共間的關係發展上，取得掌握者 (holder) 的地位；(3)以經濟誘惑與折衷解決漁業問題之政治暗示，促使日本不與中共過份接近；(4)致力於防止其他國家 (尤其是北韓)，觸發足以使蘇聯介入之軍事衝突，以及(5)提出「亞洲集體安全」口號，號召此一地區的國家，從速締結一些雙邊或多邊性友好條約，藉以防止亞洲情勢之失去穩定。

### 三 蘇聯政策在東亞所遭遇到的阻礙

對於東亞地區的兩個主要角色——日本與中共，在蘇聯執政者的潛意識中，有著一股先天性的恐懼，並且此種恐懼也構成了蘇聯在此一地區的多重考慮。蘇聯主要的考慮是，如何能使東亞維持著一個平靜的現狀，以使蘇聯能保持自由，足有肆應許多內外問題之餘裕，並建立其自身永久安全而鞏固的防線<sup>⑤</sup>。因之，蘇聯必須要設法克服中共與日本兩個主要假想敵，所可能加諸於蘇聯的困擾。然而，由於先天潛意識的恐懼感，乃使蘇聯在政策之制定上，顯示出一種高度的試驗性 (Tentativeness)、模糊性 (Ambiguity) 與矛盾性 (Ambivalence) <sup>⑥</sup>。

另外還有兩項基本因素，亦添加了蘇聯政策推行上的困難，這就是：(一)國際政治中的基本的、持續性的因素，諸如地理、歷史、意識形態、政治文化以及外交風格等。此一因素對於蘇聯在東亞的政策，具有長遠性的約束影響力；(二)東亞當前國際關係的特殊環境，亦即可隨具體事件而定的客觀因素。本節即擬依此種觀點而加以分析。

一九六八年以前，蘇聯領袖對於外交政策方向所顯示的表徵是「分歧」、「猶豫」和「迷惑」。當時蘇聯的對外企圖不但受制於美國，同時，在共黨集團內，復面臨了西德的東進政策、捷克的自由化運動、以及中共的挑戰<sup>⑦</sup>。爲肆應這種複雜的情勢，蘇聯乃努力於改變對美國的戰略平衡，並強調三項有利的要素業已形成：第一、戰略力量與傳統武力的增長；第二、美國介入越戰所導致的戰略力量之衰退；第三、美國未能明確釐定戰略目的，以及反共意志力的衰頹。對於來自東歐方面的挑戰，蘇聯宣布了「布里茲涅夫主義」，這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權有限論」，使蘇聯在東歐方面取得了優越的控制權。對於以中共爲主要對象的東亞方面，則以不斷的增兵和積極的亞洲政策爲因應之道。但是由於美國有逐漸擺脫越戰的傾向，遂使得東亞的國際政治環境，顯現出高

<sup>⑤</sup> Robert A. Scalapino, *Asia & the Road Ahead*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5) pp. 160-165.

<sup>⑥</sup> Arnold L. Horelick, *op. cit.*, p. 499.

<sup>⑦</sup> Vernon V. Aspaturian, "Moscow's Op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72, p. 1.

度的流動性與複雜性。這點，對於蘇聯政策的推進，自然會產生遠比在東歐方面還要大的阻力。

就傳統的權力平衡理論來看，一九七二年是蘇聯與日本建立密切關係的最佳時際，然而事實發展却並非如此。究其原因，首要關鍵為蘇聯對日本並無明確的目標，並且蘇聯亦難以放棄對日本的疑懼及敵意<sup>①</sup>。次要關鍵為蘇聯在北方四島方面未曾讓步，以及對日本沿海的海空挑釁行動，都引起了日人的強烈仇俄情緒<sup>②</sup>。蘇聯政府鑒於日本經濟實力的成長，對於日本的疑心亦越來越大，蘇聯恐怕日本會由經濟實力一躍而扮演政治上的獨立角色。這種態度遂使蘇聯陷入了矛盾性的困惑，它一方面認為日本的此種獨立角色將有助於蘇日關係的改善，譬如經濟合作即可使蘇聯的資源與日本的技术彼此互惠<sup>③</sup>；但蘇聯又担心一旦日本重整軍備後便會有大害。蘇聯認為當日本軍事能力足以與強權配稱時，則它的外交政策亦必然會發生急遽的變化。根據蘇俄的看法，只要日本不再依賴於美國的保護，並且不再是第三等的軍事國家，那麼縱使日本與蘇聯的政治關係已獲改善，則一旦蘇聯與中共發生衝突時，日本終究會作出「抽後腿」的事來<sup>④</sup>。另外，在實質問題上，蘇日關係的重點，主要包括下列諸事：(1)和約問題；(2)領土糾紛；(3)西伯利亞開發；(4)漁業問題；以及(5)國家安全與東亞的四角關係<sup>⑤</sup>。日方對於上述問題的觀點是：(1)在和平條約方面，認為和約的簽定不能付出太高的代價，因之，日本不能犧牲領土；(2)對北方四島糾紛的立場，日方主張早在十九世紀，該四島便是日本的領土，並且在一八五五年日蘇第一次商討領土問題的下田條約中，俄國即已承認此一事實。雖然北方四島並無特殊的軍事重要性，但是擇捉島為一優良的不凍港，對蘇聯自有相當用處。日本認為除非蘇聯態度表明，否則一切都不會談攏；(3)西伯利亞的開發，固然對日本有利，例如，在原經議定而目前已遭擱置之秋明油田計劃中，日本預定提供蘇聯十五億美元的信用貸款，並且出售足使蘇聯建築

註① Joseph M. Ha, "Moscow's Policy Toward Japan," *Problems of Communism*, September-October 1977, p. 61; Arnold L. Horelick, *op. cit.*, p. 506.  
S. P. Seth, "Soviet Image of Japan," *Pacific Community*, April 1977, p. 490.

註② 據棉實讓治測度，日本人年齡在六十歲以上的人之中，仇美與仇俄的比例為3%與22%之比。另據遠東經濟評論報導，由於蘇聯的刺激，日本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See Watanuki's Report of "Contemporary Japanese Percep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Quoted from Alice K. & Yasumasa Kuroda, *Peace & Development in the Pacific: A Projective Analysis*, *Pacific Community*, April 1976, p. 354; See also Russel Spuer, "Japan Dign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August 26, 1977, p. 22 & Arnold L. Horelick *op. cit.*, p. 506.

註③ 據一九七四年蘇聯統計，日本由蘇聯進口之物資，可加工木材，在17%以上，其中10%用於消費；其餘物資之進口與消費比率如下：棉為14%與12%；鹹水鹽為25%與25%；石棉為15%與15%；錫為30%與10%；次級鉛為40%與8%；鉛為40%與80%；在另一方面，蘇聯亦為日本產品的主要市場。  
From S. P. Seth, *op. cit.*, p. 492.

註④ 對於以上論述，蘇聯方面的主要意見，在以下諸論文之中均有暗示。E. Earschchuk, "Japan Policy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1974 (Moscow), pp. 79-86; I. Latshev, "Japan at a Diplomatic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Affairs*, October 1975 (Moscow); pp. 61-69; G. Krasin, "Soviet-Japanese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y 1976 (Moscow) pp. 32-38. 此外俄文之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MEMO)亦有不少，經英譯收入 W. W. Kuski, *The Soviet Union in World Affairs: A Documented Analysis, 1964-1972* (Syracuse, N. 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2-149. 可參本文參考。See also Arnold L. Horelick, *op. cit.*, p. 507.

註⑤ Elizabeth Pond, "Japan & Russia: The View from Tokyo," *Foreign Affairs*, October 1975, p. 144.

由伊爾庫次克到太平洋沿岸，長達四千三百英里油管所需的鋼材；而日本則可在未來廿年內，取得每年二千五百萬噸的含硫石油。但是若爲了實施此項計劃而招惹了中共，以及因爲此項計劃的實施而使蘇聯有能力增加其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則便不是日本所願見的。(4)在漁業糾紛上，日本最注意漁區污染以及扣留日本漁船及漁民等問題，這本是一個老問題。日本認爲情況不但不會改善，而且可能還會更糟；(5)對安全與東亞的四角關係，日本仍以蘇聯爲潛在的軍事威脅者；而就四角關係論，日本認爲對於蘇聯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只有在不排除美日安保條約，以及中共亦得加入的情況下，日本才有接納的可能；但這一點恰好又是蘇聯所不願意採納的。

蘇聯對於中共的決策或行動，結果只是加深了中共對蘇聯的敵視，進一步地限制了蘇聯對東亞政策的選擇途徑。蘇聯領導者對於中共的壓制，一種假設，即只要中國大陸仍控制在敵對者的手中，則逐漸成長中的中共勢力，將可能會在未來的某一時機，迅速將潛在威脅轉變爲對蘇聯的實際威脅。爲應付此一迫切的問題，蘇聯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即陳重兵於邊界，但是就連蘇聯專家私下亦和西方分析家一樣認爲，此乃蘇聯過度反應的一種表徵，所得的只是心理上的自慰而已<sup>②</sup>。

從蘇聯當前及其遠程利益而言，與中共達成和解是最佳辦法，其次，則設法減低雙方的緊張關係。如果匪蘇雙方領導人物均已更迭，或者現在的掌權者願意彼此重估國家利益，則匪蘇可能會在邊界問題上獲致協議，並實施相互裁減駐於邊界上的機動部隊、火箭基地、與永久性砲兵陣地。但是要說像這樣做法，就能使雙方完全停止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則未免是過於樂觀。換言之，中共業已構成了蘇聯對外政策推進上的永久性阻力。蘇聯最好的預期，只能寄望於此一阻力在未來不會變爲比現在更難處置，那就是相當滿意的境界了。

論及蘇聯在朝鮮半島上的戰略利益，我們可以這麼說，任何大規模的韓戰均將是對蘇聯利益的最高威脅，即使蘇聯自制而不直接參予戰事，亦很難想像戰爭會對蘇聯有利。因爲如不能制止北韓南侵，則將嚴重打擊蘇聯作爲超級強權和「亞安體系」推行者的威信，即或北韓獲勝，亦不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因爲蘇聯與美國的和解將因韓戰而終寢；日本則將因此而重整軍備，或者竟考慮走上核子選擇途徑。此外，在美、日兩國共同利害之下，日本也可能成爲東亞主要傳統軍事力量的基石。再者，朝鮮半島若在平壤控制之下，則統一的韓國或會漸漸傾向中共；果真如此，則將對蘇聯更不利。總之，一個統一而強大的共黨韓國，將會逐漸疏遠蘇聯，而減少了蘇聯所可能加諸於目前北韓之影響力。因之，蘇聯的明顯利益是維持目前「兩個韓國」的現狀<sup>③</sup>，不希望有任何強烈

註② Arnold L. Horelick, *op. cit.*, pp. 502-503.

註③ 一九七一年以來，蘇聯即減少稱平壤爲韓國的唯一合法主權。對於北韓所積極推動的不結盟國家會議，在蘇聯報刊上亦不予以顯著刊登。此外，並開始與南韓從事體育、文化交流，建立貿易關係，甚至蘇聯外長葛羅米柯亦贊成兩個韓國與四強國舉行會談。See Joseph M. Ha & Gregory M. Luebert, "A Korean Settlement: The Prospect & Problems," *Asian Survey*, August 1977, p. 740.



的政治解決行動產生<sup>25</sup>。即使有國際調解出現，蘇聯也認為只有在和平穩定的情勢中，才能確保蘇聯對於朝鮮半島的影響力。因之，蘇聯是不會接受北韓的主張，而從速以武力完成北韓「統一朝鮮」的雄志的。蘇聯目前最大的困難是，如何不採取過份的、極爲明顯的「兩個韓國」的態度，否則一旦讓北韓投向中共，其害非同小可。

蘇聯對於東協國家的接近，已因美國的撤出而變本加厲。然而，在外交權衡上，這些國家只將蘇聯列爲「有限的」比重因素。東協國家對於這區域的穩定，仍係以河內與北平馬首是瞻，它之所以歡迎蘇聯，主要乃在平衡中共的力量。因此，蘇聯的過份積極活動，尤其是在海上的活動，反而會使東協國家惴惴不安。東協國家恐怕蘇聯的過份積極活動，將會破壞了它們的中立利益。迄至目前爲止，蘇聯所一再倡議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計劃，在共黨集團內，除了僞蒙外，其他均不予重視。東協國家外交政策的特徵，是寧捨「和解」而願選擇「正常化」，但避免談「結盟」。

至於南亞次大陸的印度，亦是以「不結盟」爲主要利益，新德里與莫斯科的關係乃是屬於「名高於實」的盟友關係。

總之，蘇聯在東亞雖具有潛在性的力量，但是它却是一張不能有效打出的牌。在這種情況下，蘇聯最好的打算，只能期望在未來擔任一個較爲實際的角色，即擴展屬於傳統外交、經濟型態的雙邊關係。然而，在這一方面，蘇聯也不是沒有障礙的。因爲蘇聯在亞洲的土地，尙未完全開發，此一事實足使蘇聯的能力受到相當的限制。由筆者看來，蘇聯對於東亞事務在未來只能做一種「選擇性的介入」而已。

註<sup>25</sup> 在不使金日成有力量發起攻勢方面，蘇聯已經開始減少對北韓的軍事需求，以一九七四年爲例，對北韓出口總值爲二億五千萬美元，比以往減少13.3%；總貿易額亦降低3.9%，以後尙有繼續下降之勢。See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 The Far East, September 3, 1975 (W482-A21-3) Quoted from Joseph M. Ha & Gregory M. Lubbert, *Ibid.*, p. 740.